

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

張 以 仁

一、前 言

前人論及國語的作者，見於文字的，似乎以太史公司馬遷最早¹。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

昔西伯囚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這段文字，又見於他的報任少卿書，文字略有異同，茲亦逐錄於下：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漢書司馬遷傳引。王先謙補注本。）

其中「及如左丘明無目」，有的本子無「明」字²。昭明文選也選錄此篇，文字與此稍有差異：如「西伯」作「文王」，「有所鬱結」作「有鬱結」，「及如」作「乃如」，「左丘」下亦無「明」字。

如果我們把這項資料牽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說的：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

1. 廖平古學考：「國語本爲七十弟子所傳，指爲邱明，始於史公。」

2. 王先謙漢書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明字。」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那麼，史遷的意見，似乎可以歸納成三點：

一、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

二、此書成於左丘明失明以後。

三、左丘明是魯君子，曾經根據孔子的史記，成左氏春秋一書，目的在防止孔門弟子各逞己說而趨異端。

太史公的意見裏，並沒有明白的說出左丘明和孔子的關係，似乎連左丘明是什麼時候的人也沒有說明。甚至連作國語的左丘明與作左氏春秋的左丘明是否同一人，「左氏春秋」是否即後來的「左傳」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交代，因而後人乃有種種不同的意見。這裏謹先提出兩個問題，加以討論：一是撰左氏春秋與國語的左丘明是否同一人？二是左丘明是否與孔子同時？這兩個問題都以太史公的意見爲基礎。

二、班固等人的說法

漢書與史記關係的密切是用不着我們多作說明的。班固對上述問題的意見相當肯定而明確。大概除了太史公之說外，尚有資料作爲依據，如翼奉、翟方進、尹咸、何武、劉歆等治左氏諸漢儒的主張。他說：

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³，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漢書司馬遷傳贊）。

他在漢書藝文志中，不僅於「左氏傳三十卷」「國語二十一篇」下分別注明「左丘

3. 孫海波「國語真偽考」以「左氏國語」連讀，意謂左氏之國語，不知此文「故」字以下，皆承前文，左氏正指前文左傳甚明。此當從裴駰索隱讀爲二書。

明，魯大史」、「左丘明著」等字樣⁴，並且在春秋家書目之後，作了這樣一段說明：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譴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又在卷三十六劉歆傳中記載：

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另外，報任安書引見於司馬遷傳中，已錄見前文，此不贅出。班氏之說，除接受了司馬遷的三點意見之外，尚增加了三項新意：

- 一、國語成於左傳之後。
- 二、國語與左傳的作者同爲左丘明。
- 三、左丘明與孔子同時，二人曾有交往。

這裏面當然還牽涉到若干別的問題，譬如史記的「魯君子」漢書成了「魯太史」，是否與左傳「君子曰」以及書法的部分有關係呢？又譬如史記的「左氏春秋」漢書變成了「左氏傳」，前者不過是一本史書，後者卻負有解經傳道的使命，其意義與地位便大不一樣。「左氏春秋」是不是「左氏傳」呢？清儒劉逢祿、康有爲等今文家所疾言肆爭的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但本文都暫置不論。

4. 清史學家趙翼云：「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顏師古本此衆說，故注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丘明撰。」竟以書目下小字乃顏師古注。說見趙氏陔餘叢考卷二「國語非左丘明所撰」條。今案，漢書藝文志書目小注凡三類：一爲未冠注者姓名者，二爲冠有注者姓名者，三爲冠有「師古曰」字樣者。第三類爲顏師古注。第二類爲顏師古錄前人注，第一類則一般學者咸以爲係班氏自注。然趙翼以爲顏注，殊可詫異！查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漢書二志小字」條云：「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爲顏氏注而併刪之。」顧氏之意甚明；說文解字段玉裁注云：「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亦以爲班氏自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史篇別錄例議」亦云：「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於班

續 4. 氏諸志，其實史遷諸表已有子注矣。」四庫集部「楚辭類楚辭章句」提要亦云：「（王）逸又益以已作九思，與班固二敍爲十七卷，而各爲之注。其九思之注，洪興祖疑其子所爲。然漢書地理、藝文志即有自注，多在逸前。」皆與趙氏之說異。清劉光蕸著「漢書藝文志注」，乃於班氏注文之上特加「原注」二字以明之；孫德謙作「漢書藝文志舉例」，更比觀正文注文以考班志之條例，如「稱出入例」下云：「吾觀班氏藝文志，其於劉歆七略，則頗有出入矣。書家云『入劉向稽疑一篇』、禮家云『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而於每略總數後又重言以申明之，在班氏亦可謂不憚煩矣。然班氏既有此例，可知依據他書，而其編次未盡得宜者，不妨由我出入之。……」又如「尊師承例」下云：「漢儒傳經，最重師承，班氏蓋審知之。不特儒林一傳，敍經學之授受，以見詩、禮諸家俱有師法也。即於列傳中，凡其人師事某某，亦必記載之。今觀藝文志，如易家蔡公云『事周王孫』，禮家記百三十一篇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於此，知孟堅撰述此志，蓋尊崇師承之至矣。……誠以史家目錄，須明乎學術源流，固不專司簿籍已也」皆合正文注文以爲說也。是劉、孫二氏，亦以爲班氏自注，與趙說不同。然則，二者之是非，何由分辨？今考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池陽」條下注云：「惠帝四年置，嶺山在北。」無注者姓名，下復有注文云：「應劭曰：在池水之陽。師古曰：嶺嶺即今俗所呼壑山是也，音截齧，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按地理志本文及應劭之注，皆無「嶺」字樣，而應劭注次其下；又藝文志易類「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下注云：「入劉向稽疑一篇」，下顏注云：「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按顏氏此注，亦與正文無涉；又儒家類「孟子十一篇」下注云：「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下顏注云：「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凡此等例，所在多有，皆可見顏注直承該無名注文而來；且細味顏注文意，如曰「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如曰「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似顏氏即以該注文出於班氏。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云：「班氏注文，或爲大字，或爲小字，其例不一，此亦後來校刊者之失，非其本然也。武進莊氏載籍足徵錄皆一律改爲大字，頗得體要。」是以姚氏盡改班氏注文爲大字，而文意銜接，無少舛鑿。然則，顏氏所見或者即爲大字之本歟？故其鉅例所謂「漢書舊無注解」者，實不包括後世改爲小字之班氏自注在內。清儒錢大昕亦嘗疑顏注有班志本文誤入者，如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南陵」條下注「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下有顏氏注云：「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錢氏云：「『古』下皆班氏本文，謂霸水古曰茲水，秦穆公始更名耳，非顏注也。『師』字後人妄加。『沂』上當有『師古曰』三字。」（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案錢說甚是，若「視子孫」爲師古注文，何不逕書「視」作「示」，乃不憚煩瑣更注「讀曰示」以明之乎？必無是理也。然錢氏於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漢書注本始於東晉」條云：「漢書敍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有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號曰漢書集注……據此，知不獨服虔、應劭音義各自單行，即晉灼、臣瓚兩家，亦不注於本文之下。直至蔡謨，乃取瓚書散入漢書。謨固東晉人也。小顏所注，蓋依蔡本而稍采它書附益之。」則錢氏似猶未曉然於班氏注文有大小之意。藝文志書目以下小字，蓋後人權衡輕重，變正文以爲之，世謂之班氏自注，名目雖異，實質不殊也。然難者或將曰：「若儒家類『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下注文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涉及『世說』及『列女傳頌圖』等書，豈亦班氏原文？」按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世說」條云：「未詳。本傳著疾纒縶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又引曾鞏等人之說，謂列女傳之頌及圖爲劉歆所作，或曹大家作，或即劉向原作，見「列女傳頌圖」條。王先謙漢書補注說與之同，且逕謂「本傳有『世頌』，疑即其書（世說）」。劉向、劉歆、班昭，或在班固之前，或與同時，見於班文，自是可能。總結以上所論，一則顏注似已認爲今本書目下無名小字注文乃班志本文；二則此等注文與正文關係密切，改爲正文，語意銜接；三則此等注文，皆廁之於應劭、服虔等注之前，且注中所引，無論人事，亦皆在班氏之前或同時，無出班氏之後者。凡此諸端，足證今本此無名之注，實班氏自爲之矣。然則，趙以爲顏師古注者，非也！

班固之所以確認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崔述以爲是源於劉歆的「親見夫子」之說且與論語有關（見洙泗考信錄餘錄卷之三）。論語公冶長篇說：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其說恐卽出於此，故顏師古注漢書劉歆傳，便引以爲釋。

以爲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其說似乎可以上溯到西漢宣帝時（公元前七十三年至四十九年）的嚴彭祖，嚴氏春秋引觀周篇說：

孔子將修春秋，與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見杜預春秋序孔疏引）。

但此說實有問題，因爲：

一、今傳孔子家語觀周篇雖亦載孔子適周之事，但內容偏重問禮以及與老子之交談，與此不同。且同行者爲南宮敬叔，非左丘明⁵。

二、史記孔子世家亦載其事，僅記問禮於老子一端，同行者亦非左丘明，而爲南宮敬叔。那時候孔子還不到三十歲⁶。今傳孔子家語，前人多以爲是王肅僞作⁷，但

5. 今傳家語觀周篇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君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堅其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6.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

孔子世家的記載卻不能不予重視。

三、嚴氏前於王肅（公元一九五至二五六年），所引家語自不會是王肅的僞本。但也可能另有問題，因為：

（一）家語來歷，自始便不清楚，而且內容駁雜，中有後世僞說羈入，不皆出於孔子門人⁸。

（二）嚴彭祖所處的時代，家法正興⁹。他與顏安樂，俱是眭孟的弟子，當時俱傳公羊之學，想來不會為左氏張目，記載一段左丘明與孔子同車共往西周觀書之事，把左丘明捧成孔子春秋經的真正傳人。

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雖載有「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的話（參前引文），漢書儒林傳雖也有「西入周」之說¹⁰，但都未記同行之人，而藝文志所記，則僅有「孔子與左丘明觀史於魯」之說（參前引文），則適周即使真有其事，也與偕左丘明觀史無關。

從上述四點看來，嚴氏春秋之說，是不足據信的。該書之所以有此一說，可能是出於嚴門弟子的意見。康有為新學僞經考漢書藝文志辨僞上云：

續 6. 而近於死者，好譏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史記老子傳也載有此事，却没有涉及孔子的年齡。如果光從史記這一段資料看，他如周問禮應在十七歲以後，三十歲以前。不過，後世學者對此多不表信從，他們或據莊子天運篇，認為是孔子五十一歲事；或以為孔子三十四歲事；或以為孔子三十四至四十一歲事；或根本懷疑此事。說詳閻若璩尚書疏證、四書釋地，梁玉繩史記志疑、崔述洙泗考信錄，崔適史記探源、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老子哲學、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等，此處不贅。

7. 王柏家語考、范家相家語證僞、孫志祖家語疏證，丁晏尚書餘論、四庫提要、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皆以為王肅僞作。參見張心澂僞書通考。

8. 孔子家語後序云：「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之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影印蜀本孔子家語，汲古閣本）。何孟春疑孔氏此序亦王肅僞作，清儒多襲何說。我認為無論僞作與否，都可看出家語的問題是頗為複雜的，因此後人得以肆意變造。

9. 參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一文，收入所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

10. 漢書儒林傳僅云：「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忌陳」。

春秋正義一引嚴氏春秋，亦有與左丘明觀書之事，蓋嚴、顏高才受學之後所竄亂者矣。

按後漢書賈逵傳云：

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材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公羊嚴、顏之學，經過百餘年，到了東漢章帝時（公元七十六年至八十八年），竟因章帝的愛好，而令二家門徒從賈逵習左氏之學。我想，嚴氏門徒，也許爲了推崇左氏，或不免將孔、左觀書之說，與適周之事混爲一談，攪入了嚴氏春秋，而時間或已在班固之後。康氏作爲此說，自不無可能。（站在康氏的立場，除了這樣解釋以外，實在也無其他更好的說法，因爲他決不肯承認嚴彭祖在漢宣帝時就已有了左丘明傳經之說，他始終認爲左傳是劉歆僞作的。）

班氏之外，主張這種說法的，如王充（公元二十二年至一〇〇年。論衡案書篇）、韋昭（公元二〇四年至二七三年。國語解詁）、杜預（公元二二二年至二八四年，春秋序）、范曄（公元三九八年至四四五年。後漢書陳元傳）、李善（卒於公元六八九年。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劉知幾（公元六六一年至七二一年。史通卷十四申左篇）、司馬貞（唐開元年間《公元七一三年至七四一年》爲潤州別駕，見唐書藝文志注。裴駰史記集解序「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句下索隱）、邢昺（公元九三二年至一〇一〇年。爾雅釋天疏）、晁公武（宋高宗《公元一一二七年至一一六二年前後》。郡齋讀書志）、李治（公元一一七八年至一二六五年。金世宗大定十八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年。敬齋古今叢註）、趙汴（公元一三一九年至一三六九年。元仁宗延祐六年至明太祖洪武二年。春秋師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高本漢（近世瑞典漢學家。左傳眞僞考），……等，歷代不乏其人，大都不出班、馬範圍。其中范曄的後漢書對於孔子與左丘明的關係，有了這樣的說法：

丘明至賢，親受孔子。（陳元傳）。

杜預序左傳，也說是：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

後來邢昺爲論語疏，也這樣說：

左丘明，魯大夫，受春秋於仲尼者也。

我想他們並非別有根據，或造爲新說，仍只是祖述班、馬而略變其詞，所以孔穎達左傳疏說：

丘明爲經作傳，故稱受經於孔子。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

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卷一「孔門傳經辨」則謂：

論語，孔子稱左丘明，其人蓋隱君子，而爲孔子之前輩。故記者以之與夷、齊、微生高諸人並列也。杜氏集解謂左丘明受經於孔子，可謂無根之談。

我們看到上文所引的資料，可知杜預之說，並非沒有源頭，劉歆之論，陳元之疏，自然不是班固、范曄等閉門杜撰。從劉歆以至杜預，其中脈絡宛然，是以崔東壁說：

劉歆云：「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謂作春秋傳者即論語之左丘明也。由是班固漢書謂孔子與左丘明觀史記，杜氏集解謂左丘明受經於孔子，蓋皆本之於此。（洙泗考信錄餘錄卷之三）。

錢氏似不得以「無根」二字議之。類似這樣的話，以晉荀崧及唐劉知幾說得最爲明顯。晉書卷七五荀崧傳錄崧上疏諫不設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博士事說：

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

劉知幾史通申左篇說：

……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受經之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

又說：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

……

我們不知道杜預所說的「受經於仲尼」的意見，是否即表示左丘明曾爲孔子的弟子門

生，或如孔穎達的解釋，以為未必面親授受，只是為經作傳之故。但劉知幾的話，雖然未明言丘明為孔門弟子，但說孔子授經於丘明，則是相當明顯而決非孔穎達的說法所能掩飾回護的。

以左丘明為孔門弟子，不知上文所引荀崧的上疏是不是最早的，他說：「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是否即意味着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如果是，則應當算是相當早的說法了。荀崧之外，元代的趙汭是明確的說出這樣的話的，他在「春秋師說」中說：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春秋師說）¹¹

姚鼐左傳補注序（見於姚姬傳全集）也曾說：

彼儒者（以仁案：指左丘明）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

不知他所說的「親承孔子學」是否即係孔門弟子之意，或僅是前人所說的「親受孔子」之意？很難分辨清楚。總之，這種說法的影子是不時浮現着的。

三、對「左丘明」一名的各種解釋

國語與左丘明的關係，就在太史公發之，班固等足之的情形下，漸次肯定下來。千載以還，頗受學者重視。但是，此一意見，並未定於一尊。即使對於太史公之說，後世的解釋，雖非人言人殊，但確實並非完全一致。自唐代的趙匡對「左丘明」一名首致其懷疑之意以後¹²，我們試沿着這條線索加以按查，便發現，除了有人對太史公之說整個否定，另倡新議¹³，不適本文討論外，曾不止一人嘗試着替太史公另作解釋。他們以為太史公並沒有說撰左氏春秋與國語的為同一人，他們以為左氏春秋的作者姓「左」，名「丘明」，國語的作者卻是姓「左丘」，名「明」；或是姓「左」，

11. 趙汭之說，出於其師。偽書通考以為是「元人蔡澤」，朱彝尊經義考卷一六九引「黃澤」亦有此說，不知是否同一人。

12. 四庫「春秋左傳正義」提要：「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

13. 如鄭樵六藝典論、陳振孫書錄解題、程端學春秋本義，趙汭春秋師說、衛聚賢左傳的研究等。

單名「丘」。這些人包括宋代的葉夢得，清代的崔述、梁啟超，以及近人衛聚賢等¹⁴，茲抄錄他們的說法於下：

葉夢得：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春秋考）。

崔述：且史記但以傳爲左邱明所作，不言爲何時人，而亦未有親見夫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億料之以爲論語之左邱明邪？說論語者，以左邱爲複姓，與公羊、穀梁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春秋、穀梁氏春秋，而此獨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則傳春秋者，其姓名果爲左邱明與否，固未可定。（洙泗考信錄餘錄）。

梁啟超：左丘或稱左丘明，今本左傳共稱爲彼所撰。然史記所稱述，則彼固名丘，不名丘明，僅撰國語而未撰左傳。（中國歷史研究法）。

衛聚賢：史遷稱：「左丘失明」，則左丘係複姓而單名明。元和姓纂「齊國臨淄縣有左丘」，是複姓左丘有其族，其書應名左丘春秋，如複姓公羊、穀梁之例。何能如呂氏春秋而名左氏春秋？是左丘明與左氏春秋名實不符。……可見二書絕非一人所作。（左傳的研究）。

另外朱熹、黃震也有類似的說法¹⁵，但不如上述諸人明確，故不具論。綜合他們的意見，可以看出所持理由有下列兩點：

一、古人有「左氏」，有「左丘氏」，因此「左丘明」可以是姓「左」名「丘明」，也可以是姓「左丘」名「明」。

二、太史公於國語作者稱「左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見是複姓「左丘」，單名「明」。或者是姓「左」名「丘」；於左氏春秋則稱「左氏」，而不稱「左丘春秋」，有如公羊、穀梁春秋，可見左氏春秋作者只是姓「左」。

也有人以爲是姓「邱」名「明」，「左」是官稱，「左丘」猶言「史遷」。清人

14. 衛氏之說，整體來講，係否定史公之說。然這一部分，却是解釋史公意見，因予以援引。

15. 朱熹：「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經義考引）；黃震：「或曰左丘複姓，非此左氏。」（日鈔）。

俞正燮即作此說：

廣韻十八尤「邱」，注引風俗通云：「魯左丘明之後」。……邱明傳春秋而曰左氏傳者，以爲左史官言之，如司馬遷書今名史記也。春秋傳公羊、穀梁題姓者，毛詩、韓詩之比。左傳不題姓者，齊詩、魯詩之比。……難者曰：「史記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複姓無疑。」此則春秋時周公爲宰，題「宰周公」，不必姓「宰周」。司馬遷後稱「史遷」，不必姓「史」。（癸巳類稿卷七「左邱明子孫姓氏論」條）。

齊詩、魯詩，以地爲名，卽如俞氏所說，「左氏」爲官稱，亦不能與之比附。這是我首先要在這裏批評俞氏之說的。

也有人以爲「左氏」是地名，而作者是左氏人吳起，如近人衛聚賢卽曾作此說（左傳的研究）。這當然是置史公之論於不顧的一種創意，類似這樣的意見尙多，例如俞正燮癸巳類稿謂「經義考言左邱傳單稱左，疑孔門避諱」卽是¹⁶，因在本題之外，暫不置論。

這些意見，紛披雜陳，亂人耳目。何者是史公原意，倉卒之間，實難臆斷。然細加檢證，卻也可以尋出若干線索，逐步釐清，而接近其實。

我們試查古書中有關資料，凡屬複姓，的確罕見僅稱姓首一字的，如淳于髡，稱淳于先生¹⁷，東方朔，稱東方生或東方先生¹⁸，而不稱淳先生或東生；諸葛亮稱葛亮¹⁹，司馬相如稱馬相如²⁰，西門豹稱門豹²¹，這種情形是有的，但決沒有人稱諸氏、司氏、西氏。這當然只是一般情形來講。特殊的例子不是沒有，比如百里奚，只稱一「百」字，魏其侯竇嬰，只稱一「魏」字²²，但一來這種情形極爲少見，二則畢竟不稱「百氏」「魏氏」。這類的例子，可以參考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

16. 此說不知見於經義考何卷，暫據俞氏以引。惟俞氏不以爲然，而程樹德論語集釋則認爲「此說最爲有理」然史記固不諱「丘」字，漢書藝文志易家復有梁丘賀。則避諱之說，亦不可靠。

17.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來，」

18. 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傳：「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漢書東方朔傳：「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

19. 晉書王濟傳：「世祖旌賢，建葛亮之祠。」

20. 李商隱詩：「梓桐不見馬相如。」

21. 朱君山墓誌，魚山本志：「門豹遺風。」

22. 王逸九思：「百貿易兮傳買。」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指周勃。

齋養新錄等書。這是一；

再進一步檢查以姓氏爲書名的，請即以漢書藝文志爲例，可以發現：凡複姓者，決不單舉一字。如易經有：

施、孟、梁丘三家。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梁丘」指「梁丘賀」；書有：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歐陽」指歐陽和伯或歐陽高等，「大小夏侯」指夏侯勝、夏侯建；禮有：

王史氏二十一篇。（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廣韻：王史複姓。」）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指司馬穰苴；春秋有：

公羊傳十一卷。

穀梁傳十一卷。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顧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指公羊高，穀梁俶²³；論語有：

23. 顏師古以穀梁子名喜，而喜，一本作嘉。桓譚新論作穀梁赤，而應劭風俗通作穀梁實，阮孝緒七錄又作俶，楊士勛穀梁疏引作淑，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阮元校勘記云：「按作俶是也。齊召南云：爾雅俶訓始，故字元始。」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指夏侯勝。其例尚多，不煩盡舉，皆稱其複姓，似無例外，這是二；

且藝文志凡言「某氏」書，意即爲某姓，既非地名，亦非官名，其例凡三十六見，更無例外，茲摘錄如下：

如易有：

易傳周氏二篇（原注：「字王孫也。」王先謙補注：「先謙曰：儒林傳：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寬至雒陽，復從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王先謙補注：「先謙曰：御覽三百八十五會稽先賢傳：淳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案宓與伏同，服亦與伏同，故服、宓、伏三字互相通假，所稱宓氏易，即此服氏也」。

楊氏二篇（原注：「名何，字叔元，菑川人。」王先謙補注：「王應麟曰：太史公受易於楊何。先謙曰：儒林傳何受易王同。」）

韓氏二篇（原注：「名嬰。」王先謙補注云：「王應麟曰：韓嬰傳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蓋寬饒從受焉。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沈欽韓曰：經典序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韓嬰傳。」）

王氏二篇（原注：「名同。」王先謙補注：「儒林傳：東武人，字子中，受易田何。」

丁氏八篇（原注：「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孟氏京房十一篇（王先謙補注：「王應麟曰：釋文序錄云：孟喜章句十卷。…先謙曰，新唐書歷志云：十二月卦出於孟喜章句。……」）

京氏段嘉二十篇（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京房弟子所撰，故冠以京氏。……」）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王先謙補注：「儒林傳：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

詩有：

齊后氏故二十卷（王先謙補注：「先謙曰：后蒼也。轅固再傳弟子，詳本傳。」）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王先謙補注：「王應麟曰：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禮有：

王史氏二十一篇（原注：「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廣韻：王史複姓。漢有新豐令王史音。先謙曰：案隋志作王氏史氏記，蓋誤。」）

樂有：

雅琴趙氏七篇（原注：「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原注：「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王先謙補注：「周壽昌曰：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七略別錄云：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言師曠後，至今邳俗多好琴也。」）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原注：「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王先謙補注：「……先謙曰：王褒傳作龔德。」）

春秋除左氏外，尚有：

鄒氏傳十一卷（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齊有三鄒子，莫知爲誰。」）

夾氏傳十一卷（原注：「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頰。」以仁案：萬姓統譜：「春秋有夾氏。」）

鐸氏微三篇（原注：「楚太傅鐸椒也。」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十二諸侯年表：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序錄：椒爲左丘明四傳弟子。」）

張氏微十篇（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疑張蒼。」）

虞氏微傳二篇（原注：「趙相虞卿。」王先謙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別錄云：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葉德輝曰：釋文序錄云：鐸椒授虞卿。」）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顏安樂也。……」）

孝經有：

孝經古孔氏一篇（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

長孫氏說二篇（王先謙補注：「長孫氏無考。惟隋志云：長孫有閨門一章。」）

江氏說一篇（王先謙補注：「先謙曰：儒林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

翼氏說一篇（以仁案：下文「后氏說一篇」下王先謙補注云：「翼奉后蒼」，則此爲翼奉。）

后氏說一篇（王先謙補注：「先謙曰：翼奉、后蒼。……」以仁案：言此后氏爲后蒼。翼奉則釋上文「翼氏說一篇」之翼氏。）

其他名「氏」者尙多，如儒家類有：

李氏春秋二篇（王先謙補注：「當是戰國時人。」）

虞氏春秋十五篇（原注：「虞卿也。」）

道家有：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原注：「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原注：「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原注：「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雜家有：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原注：「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農家有：

宰氏十七篇（原注：「不知何世。」王先謙補注：「葉德輝曰：史記貨殖傳裴駰集解云：計然者，蔡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傳云：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蔡邱濮上人。據此，則唐人所見集解本是作宰氏，宰氏卽計然，故農家無計然書。志云：『不知何世』，蓋班氏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也。」）

趙氏五篇（原注：「不知何世。」王先謙補注：「沈欽韓曰：疑卽趙過，教田

三輔者。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引崔實政論曰：趙過教民耕殖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者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王氏六篇（原注：「不知何世。」）

兵技巧家有：

魏氏射法六篇（以仁案：名不詳。）

由上引資料可知，太史公所說的著左氏春秋的左丘明，應該是姓「左」名「丘明」；而不是姓「左丘」名「明」；更不是姓「丘」名「明」而「左」爲官稱，如俞正燮所說；而「左」也不是地名，如衛聚賢所說。

古人稱謂，割裂名字的情形並非罕見，如晉文公重耳單稱一個「重」字²⁴，莒展與單稱一個「展」字²⁵等等。至於割裂名字，連姓並稱的也時有所見，如趙嬰齊稱「趙嬰」²⁶，申公巫臣稱「屈巫」²⁷，樂祁犁稱「樂祈」²⁸。到了漢、魏以後，這種情形幾成習見，如南宮敬叔稱「南宮敬」²⁹，申包胥稱「申包」³⁰，秦西巴稱「秦西」³¹，蘭相如稱「蘭相」³²……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例子，與左丘明稱「左丘」，便很相似了。然則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左丘明，也可能是姓「左」名「丘明」了。

姓「左」名「丘」的說法，康有爲曾加以駁斥，他說：

或疑作國語者爲左丘，作春秋傳者爲左丘明，分爲二人，則報任安書明云：「及如左丘明無目」，則明明左丘明矣！二人之說蓋不足疑。（新學僞經考「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第二」）

24. 魯定公四年左傳：「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

25. 魯昭公元年左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26. 魯成公五年左傳：「趙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又八年左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

27. 魯成公二年左傳：「王問諸屈巫」，「使屈巫聘于齊」。

28. 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樂祁爲司城」，又二十五年：「樂祁佐，退而告人，曰……」，又見定公六、八、九年左傳。

29. 庾信詩：「學異南宮敬。」

30. 庾信詩：「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

31. 抱朴子外篇：「秦西以過厚見親。」

32. 裴鳳別碑：「司馬慕蘭相，南容復白圭。」

不過，漢書王先謙補注本雖作「及如左丘明無目」，有「明」字，但也有無「明」字的版本：王先謙補注引宋祁曰：

越本無明字。

王念孫讀書雜誌云：

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卷四之十一）。

漢書既有無「明」字的版本，再加上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也無「明」字，則康氏的說法便顯得不那麼振振有辭了。不過，景祐本是否無「明」字，倒值得懷疑。涵芬樓百二十卷本即據北宋景祐本影印，卻有「明」字。標點本以王先謙補注本為底本，校以北宋景祐本，明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書局本，而亦有「明」字，可見王氏的說法，也不盡然。我私意以為，這句話如果有「明」字，似乎也並不累贅。上文「左丘失明」，「明」字實涵雙重意義：一寓其名，一託其事。此文如作「左丘無目」，「無目」不能代替「明」字的第一種作用，反易使人產生誤會。是否後人即因此之故而有所增刪呢？因此，即使有文選一證，恐怕一時也無法定其是非。當然，細究起來，這句話即使沒有「明」字，也不表示國語的作者便姓「左」名「丘」。史記漢書的「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與「孫子臙腳，而論兵法」（漢書作「兵法修列」）相對成文：「臙」腳的孫子即「孫臙」，與失「明」的左丘即「左丘明」，兩兩相照，意思原甚明顯。衛聚賢國語的研究說：

司馬遷一方面說：「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又一方面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而論兵法」語句相連；以孫子臙腳後始有兵法，與那左邱失明後始有國語例正同；又以孫子因臙腳人稱他為「孫臙」，與左邱因失明人稱他為「左邱明」例亦相合。國語是左邱明失明以後的作品，推司馬遷的語氣，左氏春秋當是左邱明未失明以前的作品。

衛氏的意見，雖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就本題而言，與我大體上是相合的。我認為：孫子臙腳之後，始稱孫臙，臙腳之前，豈無名字³³？也許是因為以往事功不彰，

33. 學弟陳鴻森君告我，王夫之論語稗疏曾為此說。

乃爲後名所掩。但左丘明則不然，如果像衛氏所說，未失明前，已著左氏春秋，豈是無名之輩？且失明而曰丘明，與臚腳而名臚，同中亦復有異。疑丘明一名，自是失明以前卽有，史公以其失明而纂國語，特舞弄文字，以與孫子臚腳相偶，不知一時戲筆，竟成千古疑案，這恐怕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吧？

近人毛起，所著春秋總論初稿，對這一問題，也提出了若干意見，他說：

左氏傳相傳是魯太史左邱明作的。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魯太史左邱明。左氏傳之外，他又作國語。漢志國語二十一卷，魯太史左邱明。此說歷來相傳，並無異議。到唐時柳宗元始斥國語爲淫誣，不概於聖，非出於邱明³⁴。宋葉夢得，遂說道，『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將左氏與左丘氏分家，以爲左傳之作者，是姓左，名丘明的了。此說之是非，究是如何呢？我們以爲葉氏這種說法，乃大似世之腐儒，咬文嚼字的行經（以仁案：經疑徑誤），不知文體。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之序是散文，所以可以任意達意，說魯君子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將左氏的名全舉了出來。但在答任安書中，所用的是駢句，四字一句，四四而下，方合節奏。『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若將左邱明的整個名字，放了進去，是要將和諧的音調破壞的。所以只舉左邱明之姓而不舉其名；並非是因這個左邱明，不是那個左邱明也。難者或將說，『如若兩名無分別，那末太史公儘可用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如此，於文之音律亦得保全。今不然，就可知其有別矣。』此則以文人造句，本極自由；尤其是人之名字，可以無限的變化的緣故。你看左傳內之人物名號之不一律，就可知道。但這裏氏字，則卻用不得。以氏字古代多以用之于書名，如鄒氏傳夾氏傳之類。而太史公這句裏所要

34. 柳宗元非國語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文首卽云「左氏國語」，且卷中屢言「左氏」，如「滅密」條云：「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料民」條云：「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鄒至」條云：「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大錢」條云：「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爲書皆類此矣。」……凡此皆足以證柳氏未嘗以國語非出於邱明也。且「大錢」一條，尤足以證柳氏以內、外傳之作者同爲左邱明。毛起未審察之。實則此誤已前見於朱彝尊（朱彝尊經義考引）及董增齡（國語正義序），非始於毛起也。

注重的是書，故說左氏春秋的。或者道：『人們都稱邱明作傳，譬如觀周篇所說，則是邱明是名。而左是姓了。』這也不是。古人多有單舉雙姓之一姓的；如稱司馬遷爲馬遷，諸葛亮爲葛亮。左邱明之稱邱明，也是其例耳。或者又道：『這兩者乃是後人之習慣，而非所以用於古人的。』此語亦籠統，所謂後人之習慣，究起於何時；安知不是即因古人稱左邱明爲邱明，遂用其例，而來稱諸葛亮爲葛亮，司馬遷爲馬遷呢？總之左氏傳之作者，爲姓左邱名明的，和國語之作者，同爲一人，葉氏要將他一人，分割爲二，理由是極薄弱的。

他的意見，大致與我相同，有的地方，我們可以互相補充。但他以「左丘」爲複姓，則與我的說法不一樣。我以爲，他的說法，對「丘明」連稱雖有「葛亮」「馬遷」之例以爲佐證，但諸葛亮畢竟無人稱爲諸氏，司馬遷亦畢竟不稱司氏。而且對史記、漢書中的「左氏春秋」「左氏傳」等名稱也無法解釋。

四、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

現在，讓我們討論另外一個問題：即左丘明是否與孔子同時的問題。

在司馬遷的意見裏，撰左氏春秋與國語的左丘明，是否即論語中的左丘明呢？是否即見過孔子，且與孔子同觀魯史的左丘明呢？劉歆、班固等的說法，合不合史公原意？史公所留下的資料可不可以讓我們另作解釋呢？

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自序的資料比觀，不免使人產生若干聯想：譬如年表從「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說起，說到「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使人自然覺得孔子與左丘明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因而聯想到論語中與孔子同恥的左丘明；而孔子遭陳、蔡之厄、左丘明有喪明之痛，一作春秋，一成國語，又與年表所謂「表見春秋、國語」相關，因而認爲撰左氏春秋與國語的左丘明，也就是論語中與孔子同恥的左丘明了。劉歆、班固等作爲此說，可能另外還有別的依據，例如是否向來學界就有類似的傳說³⁵？但持此說以解

35. 唐趙匡即有此說：「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丘明爲其人。」（趙氏損益義）。

史記，蛛絲馬跡，卻也不無可供蹤循的線索。後世儒者，字斟句酌，疑竇漸生，逐漸發現若干資料，舊說無法解釋。此激彼盪，爭訟乃起，攻非炫是，紛紜黑白。然試加綜合，主要論點亦不外下列兩端：

- 一、謂論語中左丘明，應是孔子以前賢人，並非孔子同輩。
- 二、謂左傳、國語中若干資料，有晚於孔子歿後若干年者，因此二書的作者，不會與孔子同時。

這種說法，見於趙匡（趙氏損益義）、葉夢得（春秋考）、鄭樵（六經奧義）、朱熹（朱彝尊經義考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程端學（春秋本義），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崔適（春秋復始）、呂大圭（朱彝尊經義考引）尤侗（經義考引）、姚鼐（姚姬傳全集「辨鄭語」）諸家，雖多立言於史記之外，或以史公為攻詰對象，與本題無直接關係，但也不妨在這裏提出來，大致予以評介。

他們所持的理由，最重要的約莫有下面幾點：

- 一、從論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治長篇）的語氣看來，丘明必孔子前輩。（趙匡、尤侗、程端學、梁啟超……等）
- 二、左傳、國語言及韓、魏、趙之滅智伯及魯悼公與趙襄子之諡號，而悼公及襄子之卒，遠在孔子之後，親見孔子且是孔子前輩的左丘明，不可能活到那個時候。（葉夢得、鄭樵、程端學、尤侗、劉逢祿、梁啟超……等。）
- 三、左傳中若干名詞晚出，如「不更」「庶長」之官爵，晚出於秦孝公時（公元前三六二年以後），「臘」祭，晚出於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是絕對不可能使用這些名詞的（葉夢得、陳振孫、朱熹、程端學……等。）

這些理由，乍看起來，似乎都可成立，細細檢討，未免各有破綻：譬如第一點，毛起便有這樣的批評：

至於同恥的左丘明，則我們連說他年歲比孔子大的一點，也不能說了，因為這話是不帶時間性的。孔子對前人固然可以這樣的說，對同時人也未始不可以這樣的說的。對年長的前輩，固可以這樣說，對年少的後輩，也未始不可以這樣的說的。所以讀了此句，我們對於左氏的年代，一點不能確定。我們所可從此

句話裏得到的，是左丘明斷不是孔子之弟子而已，因為他這句話的口氣，與他對弟子們說話的口氣不同。對弟子們是自己在前，像「吾與汝弗如也」之類，這裏卻是左丘明在前。大約孔子以其是魯史官，尊敬之之故也。主張異說者，若沒有更明確的證據，證左丘明是孔子前人，則我們還是應從舊說，定其為孔子之同時人的（春秋總論初稿）。

孔子的謙遜大概是不假的，即使經常以他為嘲笑對象的莊子，有時也不免在字裏行間無意中流露出孔子的謙遜服善的態度，如大宗師篇載有這樣一段文字³⁶：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可見孔子有時甚至對弟子都是很謙遜的，弟子學道有進，他即「請從而後」，這雖然是莊子託顏回以自矜，但無意中也就顯露了孔子的謙遜服善的態度。至於論語本書，類似的例子便不止一處了。例如公冶長篇說：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顏回再好，孔子畢竟是他的老師，如果不是謙遜成習，且有過人的服善胸懷，怎麼可能當着其他學生的面，說自己也不如顏回呢³⁷？又如八佾篇說：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36. 此項資料，王師叔岷先生檢示，書此誌謝。

37. 「吾與女」之「與」字，朱熹集注訓爲「許」，後世學者多從之。然此字固當解釋爲等立連詞，猶「和」之比。論衡問孔篇及後漢書卷八十一橋玄傳唐章懷太子注稱引此文其作「吾與汝俱不如也」，「汝」下皆有「俱」字；且橋玄傳云：「仲尼稱不如顏淵」。又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五孝友傳任敬臣傳謂任處權見敬臣之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是古本與舊說皆以「與」爲連詞明甚。惠棟九經古義、陳鱣論語古訓、錢坫論語後錄皆有此說。錢氏並謂「唐時猶未脫『俱』字，……俗本脫之，卒竟傳誤而不復足者，自南宋後矣。」此條資料，陳君鴻森提供，書此誌謝。

子夏，衛人，比孔子小四十四歲³⁸。此事發生在那個時候，而孔子居然向他說出「起予者商也」這樣的話，即使旨在鼓勵，也於無意中流露了孔子一貫的謙遜風度。他的先人正考父是有名的謙恭君子，根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他歷佐戴、武、宣三公，地位越高，愈益恭敬。他的傳家之鼎上面便鏤刻着這樣的話語：

一命而僂，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史記說他：「其恭如是！」可見孔子的謙遜是有其淵源傳統的。因此，公冶長篇所記「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實在不能證明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賢人或長輩。

關於第二點，三家之滅智伯及魯悼公之卒，皆在趙襄子卒年之前（前者在西元前四五三年，後者在西元前四二九年），因此，趙襄子的問題解決，三家滅智伯以及魯悼公的問題自然也跟着解決。至於趙襄子的問題，葉、鄭、程三人的說法便有差距。葉夢得以爲：

趙襄子之卒，去孔子五十三年。（春秋考）。

而鄭樵說：

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六經奧義）。

程端學說與鄭樵同（春秋本義）。另外尤侗、朱熹也有類似的說法³⁹，不贅。按孔子於獲麟後二年而卒，故鄭樵一作八十年，一作七十八年。但我們仔細計算一下：西狩獲麟，是周敬王三十九年事，時爲魯哀公十四年，當西元前四八一年。過了兩年孔子卒，當西元前四七九年，而趙襄子以周威烈王元年卒，當西元前四二五年。然則自獲麟至襄子之卒，不過五十六年，怎麼會是八十年？自孔子之卒至襄子卒，不過五十四年，怎麼會是七十八年？五十四年與七十八年相差二十四年之鉅，是不應含混籠統其詞的。我們想，如果左丘明二十來歲見到垂老的孔子，五十四年以後乃成左氏春秋並

38.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39. 毛起春秋總論初稿：「朱子語類：『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決非丘明。』尤侗說：『左傳記韓、魏、趙、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諡，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則丘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七八十年，丘明猶能著書乎？』……」

纂國語，也不過七十來歲。如果他三十來歲見到孔子⁴⁰，也不過八十來歲。即使到八十來歲始完成左、國二書，也不是不合情理的事。因為左氏春秋不是一天寫成，國語則只是編纂潤色而已。孔子晚年口授弟子春秋，既卒之後，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以失其真，乃以實事證驗之，其間自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說他晚年完成左、國二書，大概是很可能的。這一點毛起春秋總論初稿也約略說到，與拙見大體相同，不贅引。

再進一步探索，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的弟子，年歲小於孔子四十以上的計有：

言偃（子游），小四十五歲。

卜商（子夏），小四十四歲。

顓孫師（子張），小四十八歲。

曾參（子輿），小四十六歲。

有若（子有），小四十三歲（史記索隱及正義引家語謂「少孔子三十三歲」。）

公西赤（子華），小四十二歲。

顏幸（子柳），小四十六歲。

更有比孔子小到五十歲及五十歲以上的：

冉孺（子魯），小五十歲。

曹卹（子循），小五十歲。

伯虔（子析），小五十歲。

公孫龍（子石），小五十三歲。

這樣看來，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年齡小於孔子四十乃至五十來歲，也並不是很特殊的事，尤其不是不可能的事。

更進一步探索，在孔子弟子中，曾參活到七十歲，端木賜活到七十一歲，子思八十二歲，卜商竟活到八十八歲；根據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年」一書所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表統計，先秦諸子（含上述四人）七十四人中，活到七十歲以上的共三十

40. 孔子與左丘明同觀魯史而作春秋，見漢書藝文志；而著春秋則在其晚年，見史記孔子世家。

五人之多，幾居全數之半。其中八十歲以上的有九人，而如墨翟、陳仲，都活到九十一歲！這樣看來，左丘明活到七十乃至八十餘歲，也不是很特殊的例子。他之目盲，便可能由於年長之故。子夏因為喪子之故而喪其明，也是在他老年退居西河之上的時候（見禮記檀弓上）。

關於第三點，「不更」與「庶長」的官銜，實不始於秦孝公時商鞅之立法定制。左襄十一年「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下竹添光鴻會箋說：

商君爲秦政，備其爵制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一爵曰公士，言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四爵曰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言爲眾列之長也。十二爵爲左更……十七爵爲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爲眾長也。十八爵爲大庶長，又更尊也。……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疑商君因秦舊制，增爵二十也。說者據此疑左氏秦人，在戰國之後，故有此官。夫左氏果秦人，豈不知爵級二十爲商君所定，而反以其名強入之魯成、襄、秦桓、景之間以自取綻也？且諸官員不自商君始也。史記秦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又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此皆在春秋之末秦孝公用商君前者。卽商君初說孝公，孝公拜爲左庶長，是商君未立法前，且身爲其官矣！卽商君誅後，毀其所立法，而庶長疾戰修魚，庶長章擊楚，諸名仍存，未嘗以毀法而去之也。……

「不更」爵低，史無專載，難作探索。但「庶長」一名，遠在懷公之前，便已見於史記。如秦寧公十二年，秦本紀記載：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

那是魯桓公八年，周桓王十六年，合西元前七〇四年；秦景公十五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

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

那是魯襄公十一年，周靈王十年，合西元前五六二年；秦厲公十年，六國年表記載：

庶長將兵拔魏。

那是周元王二年，合西元前四七四年；又厲公二十六年，六國年表記載：

左庶長城南鄭。

那是定王十八年，合西元前四五一年。都在秦懷公四年（西元前四二五年）之前。景公資料，史記也許根據左傳而來，但寧公十二年的資料，不見於左傳，而早在春秋之初，秦已有「大庶長」的爵秩了！

「臘」祭之名，趙汭已辨之於前，他說：

臘字考字書別無他意，只是臘祭耳。從獵者，蓋取狩獵爲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春秋師說）。

四庫提要復據史記正義論之於後：

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

左傳僖公五年「虞不臘矣」下竹添光鴻箋說：

朱子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此未審考耳。史記秦本紀云：「（惠王）十二年初臘」。未嘗曰始立臘名也。正義曰：「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故云初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是臘，周制也。蓋秦間於戎狄，百事不能如禮。至是始能舉行臘祭與諸夏同，非謂諸夏本無臘，秦始創是祭也。始皇本紀云：始皇二十六年而并天下，改正朔，易服色，置郡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此言可爲周有臘名之確證。晏子春秋云：「景公令兵塼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亦春秋時有臘之一證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周時臘祭在孟冬，不在季冬。此傳「虞不臘矣」，亦謂夏十月。其下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杜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是臘月乃夏十月，非十二月矣。後人謂月令

取呂氏春秋，遂疑臘爲秦制。然考呂氏春秋原文，作「饗禱祖，五祀」⁴¹，並不言臘。且不韋廣致賓客著書，呂客拾古傳記，以摭入書中，今詳考其所載，皆本於先王之禮，非呂客所能辨也；且書中詆訾時君爲俗主，數秦先王之過，無所復憚，又其死在始皇十二年，至始皇並天下尙十有餘年，安見其所言者皆秦制邪？……

這些疑點，都可以逐項解釋。除此之外，其他疑點，除去若干理涉主觀或可左右爲說者不論，精闢的也並非沒有，譬如國語晉語四有這樣一段記載：

姜曰：「……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晉自唐叔始封，至靖公爲三家所滅，如不數未受周王册命的懷公，恰爲三十一世。學者或以爲這種巧合，正可用來證明國語一書乃後人所作。如果持此觀點，則國語的纂成，當晚於西元前三七六年三家分晉之後，已是孔子歿後一百零三年以上了。當然它的編著者不可能是親見孔子的左丘明，甚至也不可能是前於孫臏的左丘明。此說見於洪煥蓮先生春秋經傳引得序。但是，我們知道，瞽史之言，偶爾應驗，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並非所有應驗的預言都非要解釋爲後人所記不可。在左傳裏，也有不應的預言，顧炎武日知錄「左氏不必盡信」條說：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四庫提要也說：

41. 呂氏春秋孟冬紀舊本作「饗禱祖，五祀」，畢沅據禮記月令及呂氏春秋高誘注校改「禱」爲「先」，而「饗」字仍舊。高氏注云：「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未及「臘」字。是呂氏春秋原不作「臘」字明矣。

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

類似洪煊蓮先生的意見，我擬將來別闢專題，詳為檢討，此處便不再深論下去了。

和本文有直接關係的，應該是孫海波的意見，他說：

按左丘明之名，始見於論語公冶長章（以仁案：下引文從略），初未聞其有著書之事。及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伯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觀其次左丘于屈原之後，與孫子、不韋、韓非相雁行，似以左氏為戰國時人。（國語真偽考，燕京學報第十六期。）

孫氏對史記的了解，顯然和班固不一樣，但卻頗有可商之處。屈原的年齡，據近人的考證，大約生於周顯王二十六年（西元前三四三年），卒於赧王二十五年（西元前二九〇年）⁴²；孫臏的年歲，雖不可確考，但他活躍於齊威王、齊宣王時代，客於齊將田忌，而為威王及宣王之師，馬陵之役，大破魏軍，則是有史可稽的⁴³。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相當於周安王二十四年（西元前三七八年）至顯王二十六年（西元前三四三年）。孫臏被龐涓刖足的時候，屈原大概還沒有出生。如果史公這一段文字確依人物年代順序舉例，何以將屈原次於孫臏之前？又何以將詩經次於韓非的說難孤憤之後？當然，孫海波的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這段文字，除上述兩例，其他實皆依人物年代為序。如果我們將它分為三段：「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至「屈原放逐，著離騷」為一段，皆三字結句；「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至「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為一段，皆四字結句；「詩三百篇」以下自為一段。駢中雜散，偶中有奇，使得文章富整齊之美且不板滯，這樣一來，便無年序顛亂之弊；而左丘明既居孫臏之前，自早於孫臏；與漢書親見夫子觀書於魯的史實也相配合，自較孫氏之說為長。

只是報任少卿書卻作「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四字結句，漢書及文選皆同。除非我們認為班固或文選（所據本）有所改動，否則，此一設想，總不免有美中不足之

42. 見陸侃如屈原評傳及中國詩史卷上。

43. 參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及六國年表、田敬仲世家、魏世家。

處。不過，漢書及文選改動的可能性不是沒有的，它們不僅和史記有所不同，它們彼此也並不完全一樣，比如漢書「西伯」，文選作「文王」；漢書「此人皆意有所鬱結」，文選作「此人皆意有鬱結」；「及如」作「乃如」，前文已略提及，該節下文不同之處則更多：漢書下文：

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文選則作：（有△號者表示該字有差異）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其中差異之處，一望而知，又不止於隻言片語。可能漢書前文已錄史記篇目，乃刪報任安書「上計軒轅」至「列傳七十」一段，以免重複所致。然於隻言片語之中，我們似乎又可發現，文選有所增減之處，似較漢書尤富駢儷之態，宛轉之致。如文選「左丘」下無「明」字，使「左丘無目」與「孫子斷足」的對偶更工整（刪者固不知「明」字實含寓名與託事兩層意思，但就形式之儷偶而忽略意思之完整）；「退」下加「而」字，「考」上加「略」字，「考其行事」下加「綜其終始」句，使文章更爲委婉而周到；又下文漢書「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文選改「適會」爲「會遭」，則文義似更顯明；漢書「僕以口語遇遭此禍」，文選刪「遇」字，則文章似更簡潔。……凡此纖細微末之處，皆可窺見文選更較漢書注重文章語氣之流利與形式工整之美。這樣看來，是否由於他們的改動，使得史公原來三字結句的形式變成了四字結句？雖然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但並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更深一層說，即如漢書、文選改爲四字句，也不可能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爲一段，因爲一則下文三事，失其偶儷。二則下文又以「及如左丘明無目」與「孫子斷足」連言，則左丘明居孫子之前，似無疑義。既在孫子之前，也便能早到與孔子同時，孫海波以爲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左丘明與孔子同時人」，而報任安書及太史公自序又「次左氏于屈原之後」，說是：

以一人之言，而相異若是，殊足以啟後人之疑。（國語真偽考。）

但是，經過我上文分析討論之後，我們大概可以相信，史公的話，本身是沒有任何差異矛盾的。

五、結 語

本文除將太史公司馬遷及班固等人的有關意見加以分析並歸納要點予以介紹之外，又附帶討論到與本題相關的嚴氏春秋所引觀周篇的問題，發現觀周篇所謂孔子與丘明如周觀書之說，可能是嚴氏門徒據訛傳而羈入。而本文主要討論的範圍則有下面兩點：

一、撰國語與左氏春秋的左丘明是否同一人。

二、左丘明是否與孔子同時。

對這兩項問題的討論，本文除以太史公的意見為基礎以處理歷來有關的資料外，並從研析所得，提出下面這些意見：

一、從古人姓名稱謂的習慣以及漢書藝文志書名冠姓氏的情形，證明史記所謂「成左氏春秋」的「魯君子左丘明」（十二諸侯年表）及遭失明之痛「厥有國語」的左丘明（太史公自序）實為同一人。此人既非姓「左丘」名「明」，也非姓「左」名「丘」，更非姓「邱」名「明」而「左」為官稱，實乃姓「左」名「丘明」。

二、從孔子的謙遜態度以論左丘明非必為孔子以前賢人，用以駁斥歷來從論語公冶長篇「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語氣上所作的空洞論調。

三、推算孔子之卒至趙襄子之卒，其間不過五十四年，以駁斥鄭樵、程端學等所作的七十八年之說，推翻左丘明不可能與孔子同時之見，更因而推論左丘明可能在孔子晚年見到孔子，並同觀魯史，而在趙襄子卒後，乃完成左氏春秋並纂成國語。

四、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資料，以說明左丘明小於孔子四十乃至五十歲且見過孔子的可能性。

五、根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所附「諸子生卒年約數」表統計所得，以說明左

丘明活到七十乃至八十餘歲，並不奇特。

六、根據史實，證明秦爵「庶長」之名，早在春秋之初即有；「臘」祭一名，則係周之舊制，秦於惠文王時始行此祭，並非始創此名，以駁斥陳振孫、朱熹等以為其名晚出於秦孝公與惠文王時之說。

七、提出對晉語四誓史預言「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的解釋，以駁預言皆非當時實錄之成見。

八、指出孫海波解釋史記自序之誤，以論左丘明早於孫臏之前，不居屈原之後。

本文根據上面八項意見，斷定太史公所說的纂國語與左氏春秋的左丘明為同一人，這個左丘明在太史公的觀念裏，係與孔子同時。

後 記

本所集刊編輯會鑒於以仁曾為文論左傳與國語非一人所作，而本文則謂二書皆出左丘明之手，有前後異說之嫌，因囑略綴數言以為釋。以仁以為，本文一則旨在考論史公之說，並非闡發個人對二書作者之意見，讀者稍加留意，應不致有此誤解；二則古人於編纂與著作之間，分別亦不甚真切，左傳與國語二書，若一為所著，一為所編而略加潤色，則後世以為同出一人，亦非無此可能。然此自是另一問題，以仁日後當專文論之。

又本文在本所講論會討論之時，王師叔岷先生有所提示；付印之前，又煩學弟陳君鴻森校讀一過，有所訂補；更煩龔慧治小姐多次校對，併此誌謝。

以仁於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四日記于南港舊莊